



# 汪静之、傅东华李杜研究之比较\*

孔令环

**摘要:**汪静之、傅东华是现代李杜批评史上最早有论著问世的两位作家。汪静之的《李杜研究》一书从李白与杜甫的不同境遇寻绎二人之所以分别成为“贵族的”和“平民的”诗人的原因;傅东华的李杜研究则以“客观的诗人”与“主观的诗人”为主线贯穿全书,将其原因更多地归之于先天遗传因素的影响。汪静之、傅东华二人都对古代李杜优劣论的观点进行了重估,并在千年以来一直没有定论的话题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汪静之、傅东华二人借鉴现代文学理论,试图对李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迥异于中国古代的古典诗文批评模式,对于现代李杜研究的转型起到了关键作用,拓荒之力功不可没。

**关键词:**汪静之;傅东华;李杜研究;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4)02-0124-05

自唐朝起,已有李杜并称。对于他们的研究,代不乏人。到了现代,胡适、陈独秀等人发起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对于古典文学的重新评价也被提到日程上来。在这种情势下,上世纪20年代的李杜研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萧瑟,成果多以单篇论文出现,专著极少。汪静之与傅东华在这一时期是少有的两位对李杜有同等考量且有专著问世的研究者。汪静之出版有《李杜研究》,傅东华除撰写有《李白与杜甫》外,还选注有《李白诗》、《杜甫诗》。本文拟对二人的李杜研究稍作比较,以分析二人对现代李杜研究转型起到的重要作用。

## 一、汪静之、傅东华李杜研究概述

汪静之的《李杜研究》作于1924年,发表于1925年的北京《晨报》,1928年5月作为“国学小

丛书”中的一种出版,是现代第一部关于李杜研究的专著。汪静之在晚年所写的《汪静之小传》中写道:“从未有研究李白杜甫的书,我二十二岁著了《李杜研究》。”<sup>[1]</sup>可见对此书的自信与重视。

《李杜研究》认为李白的诗是贵族的文学,杜甫的诗是平民的文学,并从思想、作品、性格、境遇、行为、嗜好、身体七个方面,比较李杜的相异之处。该书主要观点为:思想方面,李悲观,杜乐观;李是个人主义,杜是利他主义;李属肉,杜属灵;李出世,杜入世。作品方面,李是贵族文学,杜是平民文学;李是浪漫派,杜是写实派;李多主观的诗,杜多客观的诗;李诗多“女”、“酒”二字,杜诗多“饥”、“饿”、“饭”、“肉”、“饱”五字。性格方面,李浪漫,杜敦厚;李有破坏反抗的天性,杜较保守。境遇方面,杜常穷困,李未受十分苦痛。行为方面,李不拘常调,不修小

收稿日期:2013-09-25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现代杜甫接受史研究“(2013BWX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孔令环,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河南郑州 450002),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

节,杜较拘礼。嗜好方面,李喜与豪侠贵族交友,杜喜与田夫野老为伍。身体方面,李强健,杜羸弱<sup>[2]39-42</sup>。

傅东华的《李白与杜甫》于1927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傅东华还编选有《李白诗》和《杜甫诗》,比汪静之的《李杜研究》仅晚两三年,都是此一时期李杜研究的重要成果。《李白与杜甫》认为李白是“主观的诗人”,杜甫是“客观的诗人”。关于李杜人格的差异,傅东华认为主要是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李的祖先是犯罪者,又徙居西域,而形成了李白“环奇宏廓,拔俗无类”、“慷慨自负,不拘常调”<sup>[3]11</sup>的性格。杜甫则有着纯粹文士的血统,因此生成他一副忠厚沉着的性情。关于李杜的人生观,傅东华认为李白人生观的核心是“超世主义”,杜甫人生观的核心则是儒家精神。

傅东华选注《李白诗》中有《李白评传》,梳理了李白一生的大致脉络,对“超世主义”做了更为详尽的解释:“不可仅仅解作出世或厌世……我以为这个‘世’字,应该是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而言的。大凡是天才,到了成熟之后,大都成为——或想成为——一种超人。不过这个‘超’,也有分等:有的只以思想超人,至于其他一切,都仍与寻常人一样;还有的,则不仅思想上要想超人,就是物质的生活上也要想超人,而且不仅要超‘人’,并要超‘自然’。”<sup>[4]19-20</sup>这种思想表现在艺术上,可谓“超现实主义”<sup>[4]25</sup>,其方法:“其一,不以现实为题材;又其一,虽以现实为题材,却避开写实的方法。要避开写实的方法,也只不外两途:其一,不平铺直叙,而多用暗喻;又其一,故将自然的现象搅乱,使人抓不住一点确实的观念。”<sup>[4]24-25</sup>

傅东华选注的《杜甫诗》中的《导言》,认为杜甫“是一个道地的儒教信徒”<sup>[5]29</sup>,其人格上的特点“同情和忠实”<sup>[5]31</sup>是构成杜甫诗歌伟大的全部。关于杜诗的艺术,他总结杜诗的特征有三点:一、“杜甫的诗境,曾向政治、历史、社会方面特别开拓”;二、“杜甫对于诗的形式,曾有一种新的工夫,新的试验,新的发展”;三、“杜甫是以诗为终身事业的”<sup>[5]34-35</sup>。这两篇评传与《李白与

杜甫》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共同构成傅东华对李杜的整体认识与评价。

## 二、汪静之、傅东华李杜研究之异同

在五四文坛上,汪静之与傅东华同属新文学阵营,对新旧文学看法上大体一致,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解也都吸取了西方文论的观点而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拉开了距离;但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二人却存在较大差异。

### (一)李杜优劣论的现代思辨

汪静之、傅东华都对千载以来的“李杜优劣论”进行了分析。关于两大诗人的比较,自唐已有之,主要分为三派:一派尊杜攻李,一派尊李攻杜,一派则认为李杜不分轩轻。汪静之对于前两派的观点多有批驳:“李派……用他们解释《诗经》的法子来说李诗虽说妇人与酒,不过寓意罢了,实也不失为颂咏风刺之道。这些说法可算极牵强附会之能事了。论到杜派的忠君爱国更是可笑。”<sup>[2]10</sup>“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sup>[2]12</sup>

对于将杜甫尊为“诗圣”、“周公制作”、“孔子大成”之说,汪静之的抨击更是不遗余力。他认为一个半生怀才不遇,饥寒潦倒,漂泊半九州的诗人被包装成一个被万人膜拜的“圣人”形象,被统治阶级利用来宣扬儒家思想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杜甫诗歌因此而具备了类似儒家经典的作用,几乎脱离了诗学的范畴而进入了经学的领域。这种行为貌似抬高了杜甫,实则对真正的诗人杜甫形成遮蔽,淹没了杜诗的文学价值。

傅东华也认为前两派无可取,且进一步分析了不应区分优劣的缘由。傅东华认为“应该根本否认这种批评的成立:因为凡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我们只能辨别它们的差异,而不能品评它们的优劣”<sup>[3]7</sup>。他在《文艺批评的基础知识》中说:“一个归纳的批评家也如其他科学家一样,他并不晓得程度的区别,却只晓得种类的区别……故作家与作家中间的区别尽可举出,

却不应该去估定他们的比较的价值。”<sup>[6]146</sup>

关于李白从永王璘反、严武欲杀杜甫、杜甫死于牛肉白酒之说等历代争论不休的话题,傅、汪二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傅东华认为:“永王璘初辟他的时候,并非胁迫;及反迹既露,太白不愿从逆,乃逃还彭泽,中间或曾经过一度的胁迫亦未可知。不过后来既被株连,故只得浑沌的说是出于胁迫,希可脱罪,这也是人情之常。”<sup>[3]69</sup>汪静之则说:“从前人以为太白从永王璘反叛是终生一大污点,我们现在知道反叛是不算什么的。照太白自叙,是被胁迫的,但不知靠得住不?他是有反抗性的人,确有做此事的可能。”<sup>[2]76</sup>关于严武欲杀杜甫一事,傅东华认为不必相信实有其事,但“两人俱负才气,各不相下,是有的。所以杜甫对于严武虽说愿意‘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却总以为‘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加以他看出同僚中对他妒忌,不免有‘当面输心背面笑’的态度,故不过七个月的相处,他便决然的辞幕而归了。但他对于严武的友谊并未因此减损:他仍愿跟他‘把酒……深酌,题诗……细论’”<sup>[5]20</sup>。汪静之认为从杜甫方面,有三个使严武欲杀他的可能:一、子美晚年褊躁傲诞,曾于醉中得罪严武;二、杜甫在严武幕府时与其合不来;三、严武与章彝争地盘,杜甫却与章彝友善。从严武方面看,也有三个可能:一、严武脾气厉害;二、严武恣行猛政,豺狼成性;三、严武将文人当作役夫看待<sup>[2]140-142</sup>。因此“我们固用不着硬要说严武欲杀子美,但严武确有欲杀子美的可能,何必隐匿了真相”<sup>[2]142</sup>。

关于杜甫死于牛肉白酒之说,汪静之找出四个理由支持此说:一、杜甫经常向人家要东西,公卿大人自然讨厌他;二、杜甫常因愤懑而痛饮,饮酒过度而死是可能的;三、杜甫身体极衰弱,又饿了十来日,吃牛肉白酒而死是可能的;四、杜甫自作了《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一诗后就绝笔了,也可作为证据<sup>[2]146</sup>。傅东华没有深究孰是孰非,而是认为“我们生千载后,既再找不出新鲜的证据,对于这样的聚讼,便属无法可以解决,好在无论他卒于耒阳卒于岳阳,其于我们这位可怜诗人穷愁客死的事

实,似乎没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就不必深究了”<sup>[5]28</sup>。

由上可以看出,在这些历史上无定解的话题面前,汪静之几乎在每一个话题上都刻意与传统杜甫批评中的主流观点相悖,有些论断显然出于臆测,显示出五四青年一代对封建文化观念的痛恶和矫枉过正的叛逆性,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傅东华则表现出更为理性的一面,从杜甫诗中寻找证据,说话时都留有余地,不强不知以为知,显示出一个学者坦诚的学术态度。

## (二)对现代文学理论的思考与借鉴

汪静之的李杜研究明显受到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影响。汪静之与他们都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就有交往。“1920年春寄诗请胡适之先生指教,1921年初夏寄诗向鲁迅先生、周作人先生指教,先后得到‘五四’新文坛三大名家的嘉奖鼓励和指导。三大名家的鼓励增加了我的信心,三大名家的教诲成了我的指路明灯。”<sup>[1]5</sup>三人不仅对汪静之的新诗创作起到了鼓励指导作用,在《李杜研究》中也处处可见他们的影响。

“贵族的与平民的”的观点,主要借鉴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中的观点。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一文中首次提出“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并认为平民文学代表文学进化的方向,必将取代贵族文学。在五四后期,周作人开始意识到平民主义的偏颇和贵族精神的重要性。在《贵族的与平民的》中对前文进行了修正,指出:“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指定谁是谁非,正如规律的普遍的古典精神与自由的特殊的传奇精神,虽似相反而实并存,没有消灭的时候。”<sup>[7]13</sup>认为平民精神是求生意志的体现,要求有限的平凡存在;贵族精神作为人的求胜意志的体现,要求无限的超越。二者互补,共同构成人的健全人格。汪静之关于李杜分属“贵族的”与“平民的”文学,认为这两个概念并非指的是所属阶级,而是指精神气质而言,并认为李白的思想是求胜意志,杜甫的思想是求生意志,与境遇之不同有很大关系,且强调二者没有高下之分。

汪静之认为李白的诗歌属肉,杜甫的诗歌属灵,其对于“灵”与“肉”的理解本于厨川白村的一段话:“我们有兽性和恶魔性,但一起也有着神性:有利己主义的欲求,但一起也有着爱他主义的欲求。如果称那一种为生命力,则这一种也确乎是生命力的发现。这样子,精神和物质,灵和肉,理想和现实之间,有着不绝的不协调,不断的冲突和纠葛。”<sup>[8]</sup>他说:“李是个人主义,而杜是利他主义。李为肉所霸占,而杜为灵所统治,李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而杜要求有限的平凡的生存。”<sup>[2]12</sup>然而这一解释很难把李白超越世俗,追求无限的发展的超越精神囊括进去,有些失于片面。

汪静之接纳胡适《国语文学史》的观点,高度赞扬了杜甫诗歌的白话诗倾向,认为从文言到白话是文学进化的方向,为了证明白话文学优于文言文学,胡适从历代文学中寻找当时的白话文学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关于杜甫,胡适也是大力赞扬其古体诗、绝句之类的“白话诗”,而对于他的律诗则极力贬低。汪静之指出“子美诗中白话方言甚多”<sup>[2]200</sup>,并引用胡适《国语文学史》中的话进行解释,认为“杜甫是一个平民的诗人,因为他最能描写平民的生活与痛苦。但平民的生活与痛苦也不是贵族文学写得出的,故杜甫的诗不能不用白话”<sup>[2]202</sup>。而对于杜诗用典故处则不以为然。他还以为:“《诗辨坻》云:‘工部老而或失于俚……翰林逸而或流于滑,’又云:‘歌行李飘逸而失之轻率,杜沉雄而失之粗硬。’其实,所谓俚便是用方言俗语,所谓滑便是流利,所谓轻率便是爽快,所谓粗硬便是劲健:这都是李杜的优点,何得谓为失?”<sup>[2]14</sup>这些都与胡适的文学观念相一致。

汪静之虽然在论及李杜诗歌时,认为“贵族的”与“平民的”文学并无轩轻,但在讲述生平、思想等问题时,却无疑贯穿着社会决定论的论调。傅东华则对此有透彻的分析:“我们细看近来所谓诗的唯物的解释,大概不外是诗的社会学的解释。”<sup>[6]106</sup>他认为“诗的唯物的解释”可从儒家诗教观中寻出渊源:“可见‘儒家’的论诗原也从社会着眼的。儒家所以和现在的诗的唯物

论者区别的地方,就只在立场的不同……但这不过是立场的不同,若以解释诗的方法而论,那是完全一样的。——同是社会学的方法,同是唯物的方法。”<sup>[6]107-108</sup>这里的“唯物论”指的是当时文学批评界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庸俗化倾向的论调,由此可见傅东华与汪静之立论的根本差异。

在《诗的唯物与唯心》中,傅东华还明确地表现出对“唯心的”诗的批评的好感。所谓唯心的批评,比如:“到汉朝的扬雄才发见‘神’,到魏时曹丕才发见‘气’。”<sup>[6]108</sup>实质上,这里所谓的“唯心的”诗的解释方法就是以诗学、美学的角度去评论诗歌,注重诗歌的审美特性。关于李白属“主观的诗人”,杜甫属“客观的诗人”,汪静之书中也曾谈到,但只是泛泛而谈,并没有深入。傅东华却将此作为《李白与杜甫》的中心论点,并进行仔细剖析。这种观点明显受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影响,但在借鉴时融入了自己的思考,比如王国维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sup>[9]98</sup>傅东华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李白客居长安时的一番得意经历更促成了李白成为“主观”的诗人,表现出他对李白诗歌的独特理解。

李杜诗歌的永恒魅力正来自于他们诗歌的丰富性,企图以单一性概括李杜诗歌整体的丰富性的做法并不明智。而傅东华能自觉与流行观念保持距离,知道采纳“历史的标准”来研究文学:“所谓一般历史的标准,简括言之,就是不以观察的事实迁就某种现成的前提的原则,却从观察的事实里面临时去发见原则。”<sup>[10]3</sup>但在思考问题的具体思路上,他仍不免用二元对立的模式,试图用单一性概念去统摄二人的思想与作品,无形中也影响了他研究思路的开阔与深入。对于汪静之的李属肉、杜属灵的观点,傅东华虽没有批驳,但并不认同,在评论李白时,他曾说:“我们又须晓得他这求神仙和求富贵的两种心理,并不能和西洋人的灵肉两种观念相比拟,而认为彼此冲突。他这两种心理正是相因而成的:惟其想超人,所以求富贵,但也知富贵不免受‘自然’的限制,所以更求超自然。”<sup>[4]23</sup>

### 三、汪静之、傅东华李杜研究的 得与失

汪静之、傅东华的李杜研究为现代李杜批评史上拓荒时期重要的理论著作,其开拓之力,功不可没。传统的李杜批评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考据的方法,一种是重直觉感悟式的印象批评方法。汪、傅二人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李杜诗歌,变以往感性的咏叹、推崇为理性的概括与剖析。汪、傅二人广泛借鉴现代文艺理论的方法,试图从作家入手,探讨他们的人生观与作品的关系,并试图对李杜诗歌进行整体的把握,是李杜研究由传统批评模式走向现代批评模式的重要环节。

在具体研究上,汪静之、傅东华的批评显示出诗人与学者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特色。汪静之较主观,傅东华较客观。汪静之的文字激情洋溢,汪洋恣肆;傅东华的文字平实质朴,文风稳健。汪静之是五四以后杰出的新诗人,有丰富的诗歌创作体验,故而书中论述李白的抒情艺术和杜甫的写实艺术颇为深细、独到;傅东华曾翻译过不少西方文论著作,显示出兼收并蓄的学术态度和建立新型李杜研究范式的理论自觉。汪静之的研究廓清了封建诗教观给李杜研究笼罩上的学术迷雾,冲破了封建桎梏,闪烁着可贵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光芒;傅东华的研究以一个学者的审慎致力于对李杜诗歌审美上的观照,对于发现、认识李杜诗歌的美学价值起到了积极作用。汪静之的《李杜研究》显示出新文化萌发时期特有的青春与葱茏,稚嫩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为李杜研究界注入了一缕清新的春风;傅东华则以其学者特有的严谨认真,对李杜

进行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解说。二人共同开启了李杜研究的新时代。

平心而论,二人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们不约而同地试图用单一概念来涵括李白与杜甫的诗歌,这种简约化的处理方式势必损伤诗歌的丰富性,也造成他们在行文中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弊病。汪静之用社会决定论的观点解释李杜的人生观与诗歌,更加重了研究的片面性,造成李杜研究新的思想桎梏。傅东华为了与社会决定论保持距离,将李杜人生观的形成大部分归结为遗传因素,带来了另一种片面性。

汪静之、傅东华的李杜研究是李杜研究从古典研究模式到现代研究模式转型期出现最早的论著,影响深远。可以说,现代至当代的李杜研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研究思路的创新上,研究范围的开拓上都或多或少接受了他们的影响。今天,李杜研究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虽然已远非他们所能及,但这种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却是永远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

#### 参考文献

- [1] 李白,方素平.汪静之文集[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
- [2] 汪静之.李杜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
- [3] 傅东华.李白与杜甫[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
- [4] 傅东华.李白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
- [5] 傅东华.杜甫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
- [6] 傅东华.诗歌与批评[M].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
- [7]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M].北京:晨报社,1925.
- [8] 晨报副镌[N].北京:晨报社,1924-10-5.
- [9] 王国维.人间词话[M].山东:齐鲁书社,1986.
- [10] 傅东华.比较文学史·译序[M]//[法]莫里哀.比较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9.

[责任编辑/原 孟]